

## 对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再认识\*

刘中民

**摘 要：**中世纪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发展是矛盾冲突与交流合作并存的复杂过程。双方的关系既有颇具宗教色彩的漫长冲突，也留下了许多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的佳话，但这种事实却多被冲突的历史叙事所掩盖。在近代，拒绝与规避、世俗主义与西方化、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了伊斯兰对西方进行反应的四种形式。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对于西方的反应并非简单的抵制、排斥或反抗。首先，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复杂关系，是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关系存在多种形式的重要因素。其次，伊斯兰政治思潮及其社会力量对西方的反应具有复杂多元的特点，而并非单纯地反西方。经研究，本文得出两点结论和启示：第一，伊斯兰与西方交往的主题叙事亟待重新谱写，应摆脱目前突出矛盾冲突、忽视交流合作的片面叙事；第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中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既不是宗教冲突，更不是文明冲突。

**关键词：**伊斯兰与西方；冲突与合作；文明交往

**作者简介：**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0)04-0003-2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应对”(16JJDGJW010)、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是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互动关系的历史延续。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相交织的历史中,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主导双方历史记忆的似乎更多是冲突与对抗,而不是交流与融合。无论是在两种文明之间还是在两种文明内部,“文明冲突”的观念较之“文明对话”的理念一直占据优势,进而使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复杂历史被简约化为冲突的历史,并潜移默化地主导着双方对彼此关系的消极认知和对未来关系的悲观判断。

客观而言,冲突确实构成了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西征到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从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和瓜分伊斯兰世界到二战后双方的不断交恶,从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主义到西方“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再到“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盛行和西方新保守主义对伊斯兰文明的仇视,都使双方的冲突与对抗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但实际上,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近现代,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同样构成了双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两种文明内部也都存在“文明对话”的理性声音。因此,如何超越“文明冲突论”,客观理性地看待伊斯兰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并客观评估伊斯兰因素在双方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课题。

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看来,中世纪和近代分别代表伊斯兰和西方各自在双方关系史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并对塑造双方的历史记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世纪是伊斯兰冲击和挤压西方并令西方充满耻辱的时期,而近代则是西方征服和殖民伊斯兰世界并令伊斯兰世界备感屈辱的时期,并由此塑造了双方以敌对和仇视为主线的历史记忆。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历史研究》和《文明经受着考验》等著作中,主要从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挑战—应战”的模式,解读伊斯兰与西方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sup>①</sup> 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等中东问题专家更是简单地从冲突的角度分析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甚至认为

<sup>①</sup>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英]A.J.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天然处于对抗状态等。<sup>①</sup> 在伊斯兰世界也存在类似的认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存在着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在伊斯兰主义思想家看来,西方既是伊斯兰文明误入歧途的幕后推手,更是使伊斯兰文明跌入深渊的罪魁祸首。<sup>②</sup>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伊斯兰与西方关系中尽管冲突不断,但它仅仅是双方文明交往的一部分,而相互交流、吸纳、学习同样是两种文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而言,达成这种认知并不困难,但令人不解的是,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在现实中却仍在沿着互相“妖魔化”的方向演进并不断积累仇恨。因此,无论是伊斯兰和西方这两大文明交往的主体,还是外部世界,都应摆脱从冲突的单一视角看待双方关系的习惯思维,重新客观审视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并塑造以宽恕、包容、合作为主题的文明交往关系。这也是本文对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进行再认识的主旨所在。

## 一、对中世纪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再认识

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中东地区的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波斯文明,与欧洲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交往。事实上,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产生都是上述古文明频繁交往与相互吸收的产物。众所周知,希腊、罗马文明的民主传统和希伯来文明的一神教传统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源头,而伊斯兰文明同样继承了希腊与罗马文明的某些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更是为伊斯兰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在中世纪,“西方文明曾经是伊斯兰文明的汲取者”,“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在包括哲学、数学和自然科

---

<sup>①</sup> 参见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Daniel Pipes, *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sup>②</sup> 例如,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赛义德·毛杜迪(Syed Abul Aala Maududi)认为,伊斯兰社会衰落的外部根源在于西方的现代“贾黑利亚”(蒙昧状态)。他认为,伊斯兰教诞生不久后,希腊哲学、罗马哲学、波斯哲学便开始在伊斯兰社会各领域散布蒙昧主义。自18世纪以来,由于内部蒙昧状态的加剧,西方文化即现代蒙昧主义文化也开始在伊斯兰世界蔓延。西方文化蒙昧性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世俗主义精神,在于宗教与国家、政府、社会、教育、科学的分离。它是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堕入深渊、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是伊斯兰复兴的头号敌人。参见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

学的诸多专门领域的交往情况”,对西方文明的复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许多西方人并不知道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影响”<sup>①</sup>。

当然,从伊斯兰教产生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建立后,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与扩张不可避免地同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冲突。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和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东征”构成了伊斯兰与西方两种文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留下的两种文明间的恩怨时至今日仍主导着双方的历史记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摧枯拉朽式的扩张和欧洲相对衰落直接导致了东西方的权势易位;从文化的角度看,两大帝国的斗争充满了争夺正统的宗教色彩。因此,时至今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双方仍然习惯于从文明兴衰和宗教荣辱的角度来看待双方在中世纪的冲突,却淡化乃至忘却了两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借鉴。以文明研究见长的汤因比指出,伊斯兰与西方的“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阿拉伯人刚好征服并重新统一了中东古文明的领土,他们打算把这一帝国扩张为世界国家。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sup>②</sup>。

当伊斯兰教产生之际,基督教欧洲已经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两部分,而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长期征战导致的两败俱伤则进一步加剧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因此,阿拉伯帝国在四大哈里发、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对外征服与扩张,都对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四大哈里发时期,拜占庭帝国在中东的属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和昔兰尼加<sup>③</sup>被征服;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哈里发国家的海军将拜占庭帝国的舰队逐出了地中海西部海域”,“穆斯林跨过直布罗陀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进而征服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的军队曾多次威胁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庭皇帝称臣纳贡”。<sup>④</sup>

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强盛的阿拉伯帝国不仅代表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中心。西方学者曾评价指出:“直到 10 世纪,西方还是一片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地方,它朝不保夕地保卫着自己免遭蛮族从海上和陆上发动的袭击。而在长达 4 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却享受着内部的和平与

①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 年版,第 5 页。

②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 157 页。

③ 今利比亚东部地区。

④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 73-74、80 页。

安宁,除了国内战事而外别无烦恼。因此,他们才能建立起辉煌的、令人难忘的城市文化。”<sup>①</sup>而长期从事中东史研究的伯纳德·刘易斯对当时伊斯兰文明所处地位做出了更高的评价:“伊斯兰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军队同时在染指欧洲、非洲、印度和中国。它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通过亚、欧、非三大洲广阔的商业和交通网络,进行着种类繁多的商品交易。……它已经达到当时人类文明史上艺术和科学的最高水平。”<sup>②</sup>

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被赋予宗教意义主要始于“十字军东征”。进入 11 世纪后,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在阿拔斯王朝内部建立了强大的塞尔柱帝国,它在全盛时期统治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一部分、高加索、伊拉克与波斯全境,直至咸海与阿姆河右岸的中亚部分地区,进而直接威胁拜占庭帝国的生存。这种威胁直接构成了拜占庭皇帝向罗马教皇求援并发起“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原因。对此,有西方历史学家评价指出:“拜占庭人害怕伊斯兰化的突厥部落侵占希腊基督教农民的土地,而 11 世纪塞尔柱人的势力扩张也让他们忧心忡忡。……拜占庭皇帝已经恐惧到了向罗马教皇求援,以便摆脱穆斯林威胁的地步。教皇乌尔班二世很难说是拜占庭帝国的好友,却出于自身考虑而同意救援。为极力表明教皇对基督教王国世俗君主的权威,乌尔班在 1095 年发表演说,鼓励所有基督徒投身战事,从‘邪恶种族’手中收复耶路撒冷圣墓。这一战争鼓动揭开了一系列基督徒战争暨‘十字军东征’的序幕。”<sup>③</sup>

由于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Comnenus)将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界定为异教徒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呼吁欧洲基督教王国和罗马教廷组建一支十字联军,打通从小亚细亚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圣地的“朝圣通道”,进而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这使得“十字军东征”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格局。伊斯兰问题专家吴云贵先生认为,欧洲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横跨亚、非、欧三大大陆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建立,被欧洲尤其是拜占庭帝国视为巨大的威胁;第二,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争夺欧洲权力的过程中,教皇希望通过“十字军东征”增加教皇的权力和威望;第三,宗教狂热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因素,欧洲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海

<sup>①</sup> John Joseph Saunders, *A History of Medieval Isla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p. 154.

<sup>②</sup>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pp. 6-7.

<sup>③</sup>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 100 页。

上强国对东方财富的渴望成为“十字军东征”最重要的非宗教因素<sup>①</sup>。由此可见,“十字军东征”绝不是纯粹的宗教战争,宗教只是被用来煽动战争狂热的工具。对此,有学者评价指出:“当集合起军队、筹足了军费、十字军抵达西亚边境之时,要煽动反穆斯林的仇恨,没有什么可称之为粗野和虚伪。数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最耻辱、最富于灾难性的篇章。”<sup>②</sup>

事实上,十字军杀戮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穆斯林,当 15,000 多十字军于 1099 年攻陷耶路撒冷后,“十字军对反抗的犹太人、穆斯林甚至土著基督徒施以斩首、剑刺、坠楼、拷打、火刑等种种暴行,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的记录均证实了这一大屠杀。十字军抢走了岩石清真寺(即圆顶清真寺)数以百计的银制烛台和数十金制烛台,并将这座清真寺改为教堂”<sup>③</sup>。在长达 200 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西方发起了八次“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和平共处,“现在毁于一连串的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并留下了一份不信任与误解的恒久的遗产”<sup>④</sup>。在此过程中,穆斯林的英雄萨拉丁(Salah al Din)在 1187 年~1192 年间从十字军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从而适时地使穆斯林有信心应付来自西方更严酷的挑战”<sup>⑤</sup>。

进入中世纪晚期后,在阿拔斯王朝于 1258 年被蒙古灭亡后,伊斯兰世界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裂和混乱,并在 15 世纪出现了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其中对西方威胁最大的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不仅于 1453 年攻陷了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并曾两次兵临维也纳,而且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在对欧洲的战斗中,“奥斯曼所带来的威胁比阿拉伯人的早期征服和扩张以来的任何帝国都要大……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引发的恐慌直透基督教欧洲的心脏……他们对欧洲中心所形成的威胁几乎长达两个世纪”<sup>⑥</sup>。直至 1683 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奥匈帝国都城维也纳未果,奥斯曼土耳其人被迫撤退并签署《卡洛维茨条约》,奥斯曼帝国才由此走向衰落。伴随“奥斯曼威胁的消退以及力量向获得新生和充满

①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载《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1 期,第 39-40 页。

② [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哈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7 页。

③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 101 页。

④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张晓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 页。

⑤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 104 页。

⑥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 53 页。

自信的欧洲的转移,‘基督徒的苦难之源’将很快变成‘欧洲的病夫’”<sup>①</sup>。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文明对抗、冲突和文明共处、同进是文明交往互动中两种对立又相互渗透转化的形式”<sup>②</sup>。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同样也符合这一规律。双方的关系绝非仅限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与对抗,同时也包括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与相互借鉴。因此,分析中世纪时期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必须摆脱简单将双方关系归结为冲突对抗,并特别强调其宗教冲突的狭隘历史观,而应坚持辩证的文明交往史观,“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互动,把对抗、冲突和共处、同进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使之在这个中轴律上良性和平衡地运转”<sup>③</sup>。由此出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和分析中世纪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宗教因素。

**第一,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贯穿于中世纪,并促进了彼此的进步与发展。**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进行了长期的对抗,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止过。事实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无疑继承了古代埃及人和犹太人一神信仰的宗教理念,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则是中东和西方的共同遗产。”<sup>④</sup>作为伊斯兰主体文化的阿拉伯文化就是在吸收古希腊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伊斯兰教更是吸纳了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伊斯兰文明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它不断吸收了包括西方在内的异域文明的合理成分。“哈里发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融入了罗马、叙利亚、波斯的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sup>⑤</sup>正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所言:“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已和邻国发生往来,而在伊斯兰时代的交往关系尤为频繁……希腊的学术、文化也和波斯的学术、文化一样,传布于伊斯兰教各地,散播于穆斯林之间……即使是互相悬殊的思想,也能互相调和,有如不同的种族之调和一样。调和的结果,便产生了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派、伊斯兰哲学以及伊斯兰学术艺术的活动。”<sup>⑥</sup>

①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56页。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③ 同上。

④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26页。

⑤ 同上,第71页。

⑥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63、161页。

在西方处于神学控制下的中世纪,阿拉伯文化充当了西方文化的存续者和传承人,西方学术大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回传欧洲便是鲜明的例证。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由阿拉伯文化作为中转站传入西方。因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经发挥过贯通东西方的媒介作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及文学艺术均为近代西方文化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对此,有西方历史学家评价指出,“在关系文明发展的艺术和科学领域,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个小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赖于伊斯兰世界,要想查阅许多不为人知的希腊著作,也得依靠阿拉伯语的版本”<sup>①</sup>。

第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神学上的意识形态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斯兰与西方在价值观念领域的冲突,并作用于双方的政治冲突与对抗。伊斯兰教的产生不仅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而且也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采取了基于“宗教绝无强迫”的宽容政策,并留下了许多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的佳话,但这种事实却多被冲突的历史所掩盖。

从伊斯兰教产生到阿拉伯帝国建立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种宗教之间的确存在相互鄙视,且视自己的宗教为正统的现象,其对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一神教。作为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教义教规、历史传说等许多方面沿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自产生之日起,伊斯兰教就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重申历代诸先知使命的最后一位圣人,《古兰经》是包括了《圣经》内容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并重申“认主独一论”。伊斯兰教认为自己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sup>②</sup>。

基督教也同样认为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视伊斯兰教徒为野蛮、蒙昧和残暴的落后群体。“在基督徒看来,在最好的情形下,伊斯兰教也不过是由一个骗人的或被误导的先知所宣扬的异端邪说,在最坏的情形下,则是对基督徒权利和使命的直接挑战。”<sup>③</sup>伴随阿拉伯帝国扩张带来的直接威胁,基督教徒对

①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p. 7.

② 田文林、林海虹:《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33页。

③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46页。



伊斯兰教的鄙视甚至上升到了对伊斯兰教乃至穆罕默德个人的攻击,由此开启了西方对伊斯兰教妖魔化的漫长历史。对此,著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曾评价指出,在基督教徒中,“恐惧和无知相结合产生了众多荒诞不经以致无法公开的传奇:穆斯林是一些信奉伪三位一体(指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的偶像崇拜者,穆罕默德则是一位魔术师,他甚至曾是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在争夺教皇的野心失败后,他叛逃到阿拉比亚(即阿拉伯半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教会”<sup>①</sup>。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它们都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无二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线式思维方式。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sup>②</sup>但这并非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伊斯兰教信仰主体的阿拉伯帝国对欧洲的现实威胁,进而导致双方的现实权力争夺与宗教哲学对立交互影响,并导致了双方长达数世纪的历史积怨。对于这一过程,美国伊斯兰问题专家约翰·L.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有过十分精彩而又客观的论述:

正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神学上的相似之处使双方陷入了冲突的进程之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宣称肩负某种普遍的使命;二者都是一个基于共同信仰的跨国家的共同体,都担负着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神圣使命,都是神的领地扩张并取得辉煌胜利的载体。然而,伊斯兰教的挑战不只在神学上的布道和争论这一层面。穆斯林军队和传教士的成功使人们体验到,它似乎是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对基督教世界的生存和基础构成了挑战。尽管穆斯林起初在被征服地处于少数,然而最终他们却成为多数,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众多的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此外,那些仍然信仰基督的人也阿拉伯化了,他们使用阿拉伯语,学习阿拉伯文化。几乎毫无例外,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应是防守性的,但却是好战的。伊斯兰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付的危险。貌似坚不可摧的拜占庭帝国在7~8世纪陷入了被彻底荡平的危险之中。穆斯林军队还横行于波斯帝国,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席卷了北非和南欧的部分地区,直到他们统治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和从

<sup>①</sup> Albert Hourani,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9.

<sup>②</sup> 田文林、林海虹:《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第33页。

西西里到安那托利亚的广大地中海地区。当基督教的西方、教会与国家面对伊斯兰敌人的进攻时,古代历史和神学上的亲和性就被忽视了,将对方魔鬼化、将对方斥之为野蛮人和异教徒就显得轻而易举,而理解则被抛在了<sup>①</sup>一边。

第三,“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伊斯兰与西方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极大地强化了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宗教意义,并深刻影响了双方的历史记忆,而双方曾经长期和平共处的历史却日益淡薄。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宗教哲学上的冲突虽然对双方的现实冲突有一定影响,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未演变成穆斯林与基督徒群体的冲突。在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中,尽管阿拉伯穆斯林将对外领土扩张的“圣战”视为完成真主的使命,进而扩大“伊斯兰领土”,但阿拉伯帝国对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祆教<sup>②</sup>徒,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因此穆斯林教徒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关系长期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并无宗教信徒的群体冲突,更谈不上文明的冲突。吴云贵先生曾以耶路撒冷为例,描述了自 638 年阿拉伯军队征服耶路撒冷至“十字军东征”发生前 400 余年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犹太教和平共处的情况:

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教堂、圣地、圣物成为他们自由光顾的宗教活动场所。外地香客的朝圣活动也从未中断,但当时耶路撒冷圣地的重要性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11 世纪到此朝圣的基督徒总共只有 117 人。此外,长期以“异端邪说”的名义遭到打压的古老的犹太教也在伊斯兰“宗教绝无强迫”思想的指导下得到某种保护。阿拉伯统治者容许被基督教扫地出门的犹太人返回故土,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教信徒返回耶路撒冷后,获准享有宗教自治的权利,可以在圣殿山的所罗门和大卫之城的遗址举行祷告。阿拉伯穆斯林本着宗教宽容精神,把犹太教徒、基督徒等信奉“启示宗教”的信徒统称为“有经人”,其地位当然要低于信仰“真主”的穆斯林,但仍与他们和平相处,甚至可以娶“有经人”的女子为妻。为纪念穆斯林军事征服的胜利,阿拉伯人在圣殿山上兴建了两座清真寺,即保存至今的阿克萨清真寺和以二世哈里发命名的欧麦尔清真寺。从阿拉伯穆斯林攻占耶路撒冷到 1096 年欧洲基督徒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从未听说过在多种宗教信徒聚居的耶路撒冷发生过一次宗教冲突,更未

①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 46-47 页。

② 祆教是波斯人在伊斯兰化以前信仰的宗教,其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因此也称琐罗亚斯德教。

有什么“文明的冲突”，留下的只是各教居民友好交往的佳话。<sup>①</sup>

对于阿拉伯帝国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宽容，一些西方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有西方学者指出：

对于拜占庭和波斯领土上的许多已屈从外国统治的非穆斯林来说，他们并不是失去了独立，伊斯兰的统治只是意味着统治者的变换，而且，新的统治者往往更为灵活、更加宽容。现在许多人享受着更大的地方自治，缴纳的税收也更低。拜占庭人失去的阿拉伯土地把希腊—罗马统治换成了新的阿拉伯人，他们与当地的人同属于闪族人，在语言和文化上有着更为密切的亲合性。从宗教的观点看，伊斯兰教证明是一种更加宽容的宗教，它给犹太人和当地的基督徒提供了更大的宗教自由。……非穆斯林可以有三种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公社的正式成员；保持自己的信仰，缴纳人头税；如果拒绝伊斯兰教，也不接受“被保护”的地位，那么，战争将持续到伊斯兰统治被接受为止。<sup>②</sup>

如前文所述，尽管“十字军东征”有着深刻的世俗原因，但它却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宗教意义和文化意义。“十字军东征”不仅在当时构成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共同灾难，并持续达两个世纪之久。更为重要的是，“十字军东征”打着“拯救灵魂”的宗教旗帜，使基督教首次成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工具。与此同时，也正是在应对十字军挑战的过程中，穆斯林的军事力量和不宽容性都有所增长，而阿尤布王朝的奠基人萨拉丁则被誉为“穆斯林抗击西方基督徒的典范”<sup>③</sup>。

就“十字军东征”对于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历史影响来说，其最消极的作用在于深刻影响了双方的历史价值观和民族感情。双方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不断地从“异教徒”的尺度认知和看待对方，进而强化了双方的相互仇恨与敌视，致使“十字军东征”成为固化在双方记忆中的历史影像。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一方都把自己对信仰的献身精神，把父辈们反对异教徒的英勇行为和史诗般的历史故事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之中。所以，每当东西方关系中出现一点风吹草动，这种共同的历史遗产造成的原型思维逻辑和脆弱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生作用，导致不理智的行动”<sup>④</sup>。

①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第39页。

②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47-48页。

③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104页。

④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第41页。

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对于西方来说,“十字军东征”确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神话般的历史观念:首先,基督教世界通过“十字军东征”赢得了对“异教徒”的胜利;其次,解放耶路撒冷是“十字军东征”的根本目标。但事实上,西方的许多人对“十字军东征”的实情所知甚少。确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十字军东征”,他们为什么而战,战争是如何取胜的。对于穆斯林来说,“十字军东征”依旧刻骨铭心。在他们看来,“十字军东征”是好斗的基督教的最清楚的例证,是基督教西方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先兆,是基督教早期敌视伊斯兰的生动提示。如果有人将伊斯兰教当作屠杀的宗教,从古到今的穆斯林都会说这不过是西方十字军的心态和野心。因而,对于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来说,“在‘十字军东征’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如何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的”<sup>①</sup>。

## 二、对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再认识

有英国学者曾经指出,“伊斯兰教从发端年代开始,便一直处于西方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挑战之下。而从 16 世纪开始,这种压力达到了极其紧张、完全无法逃避的程度”<sup>②</sup>。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唤醒了在经院哲学中沉睡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古老的基督教开始放弃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神学政治传统和价值取向,通过提倡平等、自由、博爱的新教伦理精神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17~18 世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工业革命创造的辉煌物质文明、大量原始资本的血腥积累唤起了基督教社会的优越感,作为历史宿敌的伊斯兰世界再度成为其征服的对象。“伊斯兰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队,是科学技术。穆斯林便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sup>③</sup>

事实上,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就开始悄然发生权势盛衰的易位。如果说 13 世纪以前是伊斯兰世界强盛和西方落后的时期,那么 13 世纪~18 世纪则是伊斯兰世界走向衰落,西方趋于强大,双方水平大致相当的时期;而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伊斯兰世界全面走向衰落,西方走向全面强

①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 48-49 页。

② [英] 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高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9、57 页。

③ 马进虎:《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的诠释》,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第 71 页。

盛<sup>①</sup>。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攻势,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和穆斯林的屈辱感进一步加深。“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西方的优势地位和由此获得的主导权;西方侵害着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每个方面,更为痛苦的是,甚至侵犯着他们的私人生活”<sup>②</sup>。从此以后,“殖民主义将主宰穆斯林的历史和心理,并继续严重地、有时甚至是剧烈地影响着今天西方与伊斯兰的关系”<sup>③</sup>。

在欧洲从16世纪开始殖民主义扩张之际,奥斯曼帝国虽已呈现颓势,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对于欧洲而言,“伊斯兰世界看来仍是个难啃的坚果”,“欧洲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最初扩张似乎跳过了伊斯兰世界,至少跳过了在中东的核心地区”。<sup>④</sup>西方对中东的全面殖民扩张始于18世纪晚期。在西方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地进而形成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东方问题”的过程中,俄罗斯扮演了先锋者的角色。俄罗斯于1696年便获得了在黑海的立足点,1783年吞并了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进入18世纪后,在俄罗斯继续在黑海和高加索一线进行扩张的同时,英国和法国加入对中东的争夺。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被西方和中东的历史学家视为西方与中东关系的历史分水岭”<sup>⑤</sup>。

进入19世纪,西方对中东的殖民扩张全面展开。对于19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衰落,巴基斯坦学者赛义德·马哈茂德(Sayyid Mahmud)曾指出:“19世纪是伊斯兰教的昏暗时期。其间,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均已开始崩溃。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长期斗争,似乎已经以前者的胜利告终。”<sup>⑥</sup>

在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赢得了对黑海的控制权,黑海从此不再是穆斯林的内湖,同时还占领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地区。在阿拉伯地区,英国于1839年占领了亚丁,并将波斯湾沿岸地区<sup>⑦</sup>纳入其殖民体系;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并掌握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sup>⑧</sup>法国于1830年和1881年分别占领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并于1912年宣布摩洛哥为其保护国,叙利亚和黎

① 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②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p. 1.

③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53页。

④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⑤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New York: Harper&Row, 1964, pp. 32-34.

⑥ 转引自肖宪:《当代国际伊斯兰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⑦ 即后来的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

⑧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pp. 34-35.

巴嫩也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1912年,意大利征服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sup>①</sup>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土耳其和伊朗尚保持独立外,包括整个中东在内的伊斯兰世界都处在欧洲的控制和占领之下。中东史专家阿尔伯特·胡拉尼曾指出:“到1918年,英国和法国对中东和马格里布的军事控制已经达到最大限度。而更为重要的是,多年来统治和保护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受欧洲控制的奥斯曼帝国已趋于灭亡。”<sup>②</sup>

从18世纪西方发起对中东的殖民主义扩张,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完成和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两个多世纪期间,中东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反应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sup>③</sup>。

第一,拒绝和规避。拒绝是指否认西方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拒绝与欧洲人合作;规避是指不与强敌正面交锋,像当年先知穆罕默德那样率领信徒转移到一块远离殖民统治的安全之地。<sup>④</sup>“对许多宗教领袖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拒绝与殖民主义主子发生任何关系,……任何形式的合作都会被看作是投降或叛教。”<sup>⑤</sup>

第二,世俗主义与西方化。世俗主义与西方化是指伊斯兰国家在学习西方军事、行政、教育、经济、司法等领域改革经验的同时,限制伊斯兰教在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使之成为个人生活领域中的私事。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旨在加强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意味着“还政于民”,或与人民分享权力,因而也不可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sup>⑥</sup>奥斯曼帝国、埃及和伊朗的穆斯林封建君主都曾采取这种学习西方以自强的方式<sup>⑦</sup>,但都未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之梦。这种效仿西方的改革不仅未能成功,而且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合法性的瓦解。“当国家的思想意识、法律和各组织机构倚重于外来的模式时,传统的伊斯兰基础和穆斯林社会的合法性逐渐蜕变,世俗化日益加强。”<sup>⑧</sup>世俗化、西方化的改革也加剧了穆斯林社会的分化,亦即亲西方的政治精英、知识

① Bernard Lewis,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1-22.

② 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15.

③ 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对欧洲殖民主义反应方式的类型划分,参见[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68-99页。

④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第41页。

⑤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68页。

⑥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第41页。

⑦ Alan R. Taylor, *The Islamic Question in Middle East Politic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8, pp. 3-4.

⑧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69页。

精英与传统的伊斯兰势力之间的分化与对抗。

第三,伊斯兰现代主义(也称伊斯兰改革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结束期间,伊斯兰现代主义作为由穆斯林知识精英发起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改良运动,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增强伊斯兰自身的力量。现代主义者崇尚科学、呼唤理性、提倡教育、重视改革,以较为冷静和客观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以严肃认真的精神来审视伊斯兰文化传统。但他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矛盾的文化心态:既仰慕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又对异域异质的西方文化抱有一定程度的排斥。

第四,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至解体的内部危机和西方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多重外部压力,造成了伊斯兰世界深刻的生存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和认同危机,而中东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回应。在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中东“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都曾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并受到自由民族主义理念和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影响,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诸如民主、立宪政府、议会政治、个人权利和民族主义。与依赖于对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的传统的伊斯兰政治理想不同,现代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种族和历史”<sup>①</sup>。

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来看,它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历史相似性,即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做出回应,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摆脱外来殖民统治而得以完成的。从中东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来看,民族主义对于唤醒中东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确立民族认同,确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民族主义对中东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整个20世纪的中东历史与民族主义在中东的兴起有着重要的联系。

民族主义在中东的产生促进了“中东的觉醒”,揭开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地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在19世纪启蒙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思潮”<sup>②</sup>。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

<sup>①</sup>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80页。

<sup>②</sup> 同上,第41页。

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持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并不能挽救民族危机,而是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上解决伊斯兰社会所面临的全面危机。在 20 世纪初,1908 年~1909 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05 年~1911 年的伊朗立宪革命,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成为中东觉醒的重要标志。其历史意义在于“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推向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结束了中东社会自列强入侵以来一国又一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揭开了一国又一国起来革命,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的历史”<sup>①</sup>。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地区出现了两次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一系列民族国家相继诞生。中东地区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高潮由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1919 年~1922 年)、阿富汗的反英独立斗争(1919 年~1921 年)、伊朗的反英民族运动(1919 年~1921 年)、埃及的反英独立运动(1919 年~1924 年)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其历史进步性突出地体现在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化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第二次反帝反封建的高潮突出地体现为中东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和伊朗的礼萨·汗改革构成了其主要标志,现代化和世俗化构成了改革的主体内容,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推动了中东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此外,阿拉伯统一运动也得到了深入发展。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巨大危机,迫使中东伊斯兰国家将追求民族独立与复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如前所述,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对于西方采取了四种反应方式,即拒绝与规避、世俗主义与西方化、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前三种反应方式均告失败,而民族主义则构成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此过程中,中东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各民族对于西方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并非简单的抵制、排斥和反抗。对于西方文明代表的现代化及其先进制度,中东伊斯兰国家如奥斯曼帝国及其继承者土耳其、埃及、伊朗等国家进行了积极的学习和效仿<sup>②</sup>,同时又寻求努力摆脱西方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侵蚀。

在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由于民族主义构成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伊斯兰教的作用在整体上呈下降的态势。但是,伊斯兰教作为中东地

① 彭树智:《巨变的世纪和变革的中东》,载《西亚非洲》1990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②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pp. 28-69.



区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传统文化,它仍然能够以不同方式渗透于各种类型的中东民族主义之中,伊斯兰力量也广泛参与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也纷纷形成,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如何看待和认知西方构成了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伊斯兰因素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复杂关系,是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关系存在多种复杂形式的重要因素。**

中东民族主义主要有土耳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三种主要形态,它们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有各自的特点<sup>①</sup>,并对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耳其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凯末尔主义,其根本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并且从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生活、社会习俗等方面全面动摇和瓦解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根基。对于现代土耳其而言,凯末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此,土耳其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转变为世俗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转向现代欧洲文明”<sup>②</sup>。

具体来说,凯末尔主义所体现的世俗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共和制取代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的自由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属性、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以及倡导改革的世俗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sup>③</sup> 凯末尔的“基本理想是构建一个伟大的、被解放的土耳其,它甚至比当代文明更发达,它要成为一个按照西方标准生活的国家,是西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塔图尔克(即凯末尔)懂得这一理想只有通过一切领域的世俗化才能实现。他对历史的理解和他自己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西方只是在所有的秩序全都世俗化后才达到这样高的生活水准”<sup>④</sup>。有土耳其学者认为,土耳其世俗化的目标就是西方化和融入西方,“为了在西方文明的范畴内建立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了从乌玛制度逐步演变到民族国家制度,把我们自己从阿拉伯宗教哲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完全

---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1 页。

③ 参见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第 163-175 页。

④ Kamal Karpa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 326.

必要的”<sup>①</sup>。因此,从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来看,凯末尔的世俗民族主义尽管要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但由于它通过废除哈里发制度和苏丹制度摒弃了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传统,进而为现代土耳其走上西方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直至在战后加入北约进而成为西方盟友扫除了障碍。

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不仅有别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也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是在什叶派伊斯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民族主义,具有自身的特色”<sup>②</sup>。在近代,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体,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sup>③</sup> 按照约翰·L.埃斯波西托的说法,伊朗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1870 年~1914 年)<sup>④</sup>。早期伊朗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宗教领袖的领导下,以什叶派宗教文化为依托,朝着回归宗教传统方向前进的运动,并突出表现为 1890 年~1891 年的“烟草抗议”(Tobacco Protest)<sup>⑤</sup>和 1905 年~1911 年的宪政革命。什叶派教界人士广泛参与并领导了当时的伊朗民族主义运动,“什叶派的意识形态、象征、领导作用在这场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双重意义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⑥</sup>。

然而,在宪政革命失败后,1925 年建立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开始了畸形、激进的现代化进程,强制性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导致世俗与神学、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不断激化。巴列维父子一方面寻求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妥协与利用,另一方面又

---

① Kamal Karpa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 323.

②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 239 页。

③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伊朗民族主义》,载《西亚非洲》2008 年第 12 期,第 39 页。

④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0.

⑤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英国和沙俄在西亚、中亚的争夺,伊朗成为英国和沙俄的势力范围。1890 年伊朗国王给予英国公司烟草销售和出口的垄断权,激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场由宗教学者和商人领导的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爆发,并且得到了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阿富汗尼的支持。宗教学者发布了禁止吸烟的法特瓦(宗教法令),并且成为这场史称“烟草抗议”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891 年,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地爆发了抗议烟草专利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国王的决定。在“烟草抗议”这场持续一年多的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中,一批颇有威望的宗教权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宗教教法权威解释者的名义发布命令,号召各地教民在废除烟草协议前进行禁烟运动,所有的烟草商店纷纷响应并停止营业。迫于巨大的民众压力,国王被迫于 1891 年底废除了烟草专利协议,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参见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p. 82;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4, p. 12.

⑥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1984, p. 83.

依靠君主制王权的独裁专制,推行全盘西化的世俗化改革,从而使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并使双方的矛盾在小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时期达到空前的程度,最终导致了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另一方面继续推行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根源,并使伊朗发生了从巴列维王朝时期亲西方到伊斯兰革命后反西方的革命性变化。<sup>①</sup>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最为复杂。由于阿拉伯民族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因此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导致的哈里发制度解体、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伊斯兰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的现实对阿拉伯民族的冲击更为剧烈,进而使得阿拉伯民族对西方的反应更为复杂。对于这种复杂性,吴云贵先生对此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

阿拉伯民族主义按其地理分布有两种基本形态。一个是东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包括更加重视领袖人物作用的纳赛尔主义和以叙利亚、伊拉克为中心的复兴社会党民族主义。另一个是西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包括突尼斯民族主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它们与伊斯兰现代改良主义关系更为密切。……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只有共同语言和宗教信仰而没有统一的祖国版图的民族主义。这种反常现象,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是由主宰中东事务的欧洲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因此,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一直是与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政治目标密不可分的。欧洲对阿拉伯人的历史债务就在于它在奥斯曼帝国解体时没有允许整个阿拉伯世界独立,以便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而是将它人为地分割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sup>②</sup>

阿拉伯世界近代的民族思潮与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以宗教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在目标与行动上具有一致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社会的意识形态逐步经历了从伊斯兰改革主义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转换。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是伊斯兰复兴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复合体,给后人留下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双重历史遗产。在20世纪上半叶,处在形成和上升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逐步实现了

<sup>①</sup> 参见刘中民:《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79页。

<sup>②</sup>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第42页。

系统化和完善化,日益占据了现代阿拉伯民族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同时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来看,该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在本身不断成熟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寻求以“阿拉伯统一”取代和超越“伊斯兰统一”。纳赛尔主义作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尽管也试图协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但纳赛尔主义作为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否定和排斥是其对待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而埃及作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其意识形态根源之一就在于回应纳赛尔主义的挑战。<sup>①</sup>

由于阿拉伯民族各部分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经分裂为许多初具国家形态的独立领地,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形态,即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它将实现自身所在地区的独立作为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尤以埃及和叙利亚最为典型。这种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较为极端,即坚持更为彻底的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立场。在埃及,尽管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仍然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历史痕迹,但主流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对待伊斯兰教的坚决的世俗化态度,以及全盘西化的政治思想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埃及地方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世俗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是排斥宗教干预政治的世俗主义的态度<sup>②</sup>。叙利亚民族社会党创始人安东·萨阿德(Antoun Saadeh)提出的叙利亚民族主义也主张排斥宗教干预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sup>③</sup>。

从伊斯兰现代主义分化出的另一重要政治思潮即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并尤以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为代表。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对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真主主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伊斯兰化与世俗化的矛盾。在群体认同方面,伊斯兰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而是对超越种族、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宗教共同体的认同;在国家理论方面,伊斯兰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理论,主张建立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伊斯兰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倡导的世俗化道路,主张实现社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4-208 页。

② 刘中民:《埃及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世界民族》2001 年第 3 期,第 20 页。

③ 刘中民:《安东·萨阿德的民族主义思想宗教观》,载《西亚非洲》2001 年第 2 期,第 23 页。

会的全面伊斯兰化。<sup>①</sup> 因此,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不仅体现为双方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矛盾,同时双方围绕伊斯兰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也必然涉及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如果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多是从民族独立的角度反对西方,那么伊斯兰主义则更多从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角度反对西方。

综上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渊源于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实现民族自强,另一方面又把重建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作为其政治理想。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导致具有世俗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宗教色彩的伊斯兰主义产生分化。二者虽然都致力于反对西方的民族独立运动,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反西方但并不反对世俗化;而后者则是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世俗化,并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和落后归咎于西方殖民入侵和世俗化导致的“蒙昧状态”,进而使其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因此,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并行发展的特点,无疑增强了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第二,在殖民主义时期,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基于宗教价值观的相互敌视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对抗,但伊斯兰政治思潮及其社会力量对西方的反应具有复杂多元的特点,而并非单纯地反西方。**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遍及全球的殖民扩张成为谱写世界历史的主体。它们蔑视、贬低其他一切人类文明,并以强悍的扩张到处“播撒基督教文明的光辉”,以“传播福音权利”说为依据进行殖民侵略。在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中,这种文化优越感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日益崛起的西方来说,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欧洲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和蔑视,作为一种历史遗产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总的说来,从阿拉伯征服经十字军东侵到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向欧洲的扩张使西方产生了对伊斯兰的疏远和不信任,并主要把它当成了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sup>②</sup>当西方逐步复兴和崛起后,这种固有的历史认知“依然留存在西欧的意识之中,依然充满恐惧,一般说来依然充满误解”<sup>③</sup>。

在中世纪时期,欧洲思想界一直以充满鄙视和敌意的态度来看待伊斯兰教。由于欧洲缺乏对伊斯兰教的真正了解,导致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认知具有近乎无知的非理性的特点。“这种无知不仅反映了知识的匮乏,也反映了受过教育和未

<sup>①</sup> 参见刘中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第16-25页。

<sup>②</sup>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56页。

<sup>③</sup> Albert Hourani,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p. 10.

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最为普遍的人性倾向:贬低敌人,将之视同禽兽,采取一种优越的姿态,给敌手贴上卑贱、异教、狂热和非理性的标签,以解除其对自己感情深切的信仰和切身利益的挑战与威胁。”<sup>①</sup>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即使是在人类思想史上享有盛誉的宗教改革领袖和启蒙思想家,仍然延续着中世纪欧洲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例如,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继续“使用中世纪的方法,把伊斯兰教看作是服务于反基督的暴力运动,它是不可改宗的,因为它已经关闭了理性的大门,即使困难重重,也只能用剑来予以抵抗”<sup>②</sup>。因此,对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而言,“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恐惧和敌视之后,伊斯兰教证明是基督徒中间争论、攻击的一个方便工具和反基督危险的象征”,此后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甚至撰文把伊斯兰教的先知塑造成了神权政治的暴君。<sup>③</sup>

伴随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伊斯兰世界的瓜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权势易位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基督教西方的潜在威胁和导致穆斯林落后和衰败的退步力量,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观。它为‘王冠与十字架’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理论根据。殖民官员和基督教传教士们成为欧洲扩张和帝国主义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排头兵。英国人称之为‘白人的负担’,法国则谈论‘传播文明’。当权力和领导权的重心从伊斯兰世界移至欧洲时,现代性就不仅仅简单地被看作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结果,它还是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的基督教固有的优越性的体现。”<sup>④</sup>

西方殖民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领域对伊斯兰世界的多重侵略与渗透,导致伊斯兰世界被强行纳入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体系,使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深受西方的控制。对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广大的穆斯林来说,西方殖民主义对伊斯兰教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欧洲是威胁伊斯兰信仰及穆斯林社会政治生活的敌人。”<sup>⑤</sup>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政治思潮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应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向伊斯兰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伊斯兰政治思想反

①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 56 页。

② Albert Hourani,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p. 10.

③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 58 页。

④ 同上,第 60 页。

⑤ 同上,第 61 页。

西方倾向日益增强的过程。

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改革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穆斯林知识精英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压力的一种反应,它“是以一批先进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伊斯兰理论家为核心,以伊斯兰教和社会政治改革为基本内容和历史使命的社会文化思潮。它的目标在于试图通过改革来协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使伊斯兰社会适应从以封建生产关系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模式向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模式的转变”<sup>①</sup>;“协调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关系,以使之适应与契合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核心任务及其理论的核心内涵。”<sup>②</sup>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主张是“坚持和改革伊斯兰教,反对殖民主义、提倡理性、崇尚科学”,其思想基础在于如下认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宗教思想的僵化将导致社会的停滞、落后和衰落,其出路在于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重新开启“创制”(Ijtihad)之门,寻求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sup>③</sup>;强大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侵略对伊斯兰社会造成了深刻压力,只有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穆斯林民族才能获得解放;西方的强大在于富有时代精神的科学文化、民主制度和理性之中,伊斯兰社会必须协调宗教与科学、理性以及民主的关系,才能摆脱落后停滞。<sup>④</sup>

伊斯兰现代主义虽然在政治上主张摆脱西方的西方殖民统治,但又主张应借鉴西方文明的合理成分,服务于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因此,“伊斯兰现代主义对西方抱有一种矛盾的双重心态,既受其吸引,又有一定程度的排斥。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赞赏欧洲的力量、技术以及自由、公正、平等的政治理想,但时常拒绝它的帝国主义目标和政策”。对于伊斯兰现代主义而言,“西方既是问题也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一方面,欧洲征服和统治威胁着穆斯林民族的特性和自治;另一方面,所有伊斯兰国家必须向西方学习,认识和利用西方力量的源泉”<sup>⑤</sup>。

然而,伊斯兰现代主义并未取得成功。进入20世纪后,伊斯兰现代主义逐渐归于沉寂,并沿着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两个方向发生分化。相对于伊

① 彭树智:《从伊斯兰改革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第169页。

② 刘靖华:《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3期,第57页。

③ Alan R. Taylor, *The Islamic Question in Middle East Politic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8, pp. 3-4.

④ 刘中民:《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第138页。

⑤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71、73页。

伊斯兰现代主义对西方的理性认知,伊斯兰主义则具有彻底的反西方的非理性倾向,并将伊斯兰化作为重建和复兴伊斯兰文明的唯一出路。埃及的哈桑·班纳和印度的毛杜迪是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先驱,他们分别于 1928 年和 1941 年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构成了对当代影响深远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归纳来看,伊斯兰主义对西方的反对和排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伊斯兰主义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构成了对伊斯兰社会的威胁,而更严重的威胁在于文化威胁,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用伊斯兰取代一切。其次,伊斯兰主义认为,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盲目效仿西方,导致了伊斯兰社会的西方化,即“西方化的伊斯兰”。

进入当代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和伊斯兰主义的崛起,西方在中东不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其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都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主义反西方的政治倾向,甚至由此衍生出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 三、结论和启示

通过前文所述可知,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是矛盾冲突与交流合作共存的过程,这与世界上所有不同文明交往的关系并无而致。但就双方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而言,矛盾冲突的叙事无疑压过了交流合作,并不断被赋予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意义。其原因和过程固然都异常复杂,但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的结论和启示,其中的教训也应为不同文明交往时所借鉴。

第一,伊斯兰与西方交往的主题叙事亟待重新谱写,并摆脱目前突出矛盾冲突、忽视交流合作的片面叙事。

在伊斯兰教兴起的过程中,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广泛吸收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周边文明的成分。正是由于“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和东罗马人以及信奉犹太教的伊拉克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交往,互相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讲述故事,从而产生了新的思想”<sup>①</sup>。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双方留下了许多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包容互鉴的佳话。在近代,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反应也并非简单抵抗和排斥的过程,而是包括了多种反应的复杂

<sup>①</sup>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朱凯、史希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25 页。



过程。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和掩盖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而是揭示伊斯兰与西方对彼此关系进行正确认知的重要性。因为基于冲突为主的历史叙事确实构成了推动伊斯兰与西方互相妖魔化的重要原因,进而使文明冲突不断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也正是今天历史上文明先哲和当代有识之士不断倡导文明对话的原因所在。

第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中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既不是宗教冲突,更不是文明的冲突。只有摆脱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叙事,才有可能实现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重述及其理性化。

如前文所述,包括“十字军东征”在内的历史绝非简单的宗教冲突和文明冲突,而是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双方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下不断被赋予神圣的宗教意义。这既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双方冲突的宗教神圣意义,也使双方的和解变得异常痛苦艰难。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当代西方在中东不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强化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但伊斯兰教并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反西方的根源。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E. Fuller)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情绪,都是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争斗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西方权力和霸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问题与宗教或哲学问题几乎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伊斯兰主义只是充当了一个载体。”<sup>①</sup>因此,伊斯兰与西方都需要对双方历史和现实中的宗教冲突进行祛魅,才有可能告别互相妖魔化的历史怪圈,并在还双方关系以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开创未来。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包澄章)

---

<sup>①</sup> Graham E.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91.